

中國文化重建的迫切性與 海內外知識分子的歷史責任

盧新華

一、話題的緣起

近幾年來，我在國內外一些不同的場合演講時，曾多次提到中國文化重建這樣一個話題。為什麼會想到這樣一個話題，主要是基於我對中國社會現狀的一些分析和判斷。當然，起心動念還與我 2013 年 6 月在北京鳳凰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所出版的長篇小說《傷魂》有關。那篇小說的主人公的名字叫龔合國，正與共和國齊名（諧音）。他從一個部隊轉業幹部，回到地方上以後開始時韜光養晦，後來努力轉型，欺下媚上，四處逢迎，將“孫子兵法”、“三十六計”等“厚黑學”應用到極致，終於爬到一個縣教育局局長的位置。再後來，眼看着年齡和文憑越來越缺乏優勢，晉升之途日益渺茫，又經不住花花世界的誘惑，心靈幾經掙扎和熬煎，終於與時俱進，迫不及待地將最大限度地攫取金錢、美女和財富作為人生的第一要務。最後東窗事發，惶惶不可終日，自首不成後，又裝瘋賣傻，以圖自保。我是將龔合國作為共和國的一個縮影來加以描寫的，寫完後，內心有一種難以言語的疼痛，那感覺正如我在扉頁上所說的——“先亂其神，再奪其魂，能不痛乎，能不傷哉？！”那之後，鳳凰頻道曾對我作過一次近兩小時的採訪，在那次訪談中，我曾形容自己

是一個給社會看病的郎中，而我對時下中國社會的診斷則歸結為十六個字——“大道流失，術數猖獗，權謀盛行，物欲橫流。”

這十六個字仔細想想，其實都與文化相關。能夠承載大道的文化不見了，消失了，流向遠方了，而那些術數文化、權謀文化，形而下的滿足人的物質欲望和身體需要的文化卻大行其道。

事實上，我對中國文化的思索應該始於 1978 年我寫作《傷痕》以後。因為造成文革時代全中國人人身心傷痕累累的，絕不僅僅是政治的和社會的原因，還有歷史的和文化的深層次的因素。就像著名經濟學家顧准，雖然比時代早三十年預見到中國必須走市場經濟的道路，卻兩度被打成右派，其間家庭破碎，妻離子散，74 歲癌症晚期彌留之際，很想見五個子女一面，卻沒一個肯來，幼子甚至還大義凜然地說：“在對黨的事業的熱愛和對顧准的憎恨之間，是不可能存在什麼一般的父子感情的。”冷血如此，這與我們歷來的忠君愛國，大義滅親的文化也有絕大的關係。所以，在我 2004 年出版的《紫禁女》一書中，我也曾借主人公石玉之口說：“常道從此不見了，消失了。音訊全無。我一有空就四處打聽，能找的地方我也都找過了，能詢問的人我也都詢問過了，但他卻像是從人間蒸發了似地，沒有留下一點痕跡……道，你快回來吧……東有大海，西有流沙，南有炎火，北有寒山……你回來吧……”那個常道在我的心目中，既是一個人，也是一種文化的符號，一個象徵。

所以，從那以後的十幾年裏，我思想的觸角越是伸向文化的縱深處探索，就越是發現一個令人十分痛心的事實：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許多優秀的部分只在港澳臺地區以及海外還能尋到一些遺跡和芳蹤，而在作為中國行政主體的內地卻日漸銷聲匿跡。而那些文化的糟粕，例如權謀家的文化，陰謀家的文化，吹捧逢迎的“頌聖文

化”，拍馬屁文化，吹喝玩樂的文化，等級制文化，官本位文化，瞞和騙的文化等等卻大行其道……領導人號召古為今用的結果是讓帝王權術得到了全面的繼承和發揚，推陳出新的結果是將儒家、道家行仁政的文化、士的精神和風骨，佛家“眾生平等”的主張等，統統趕盡殺絕，而代之以所謂的“階級鬥爭是個綱，綱舉目張”的專政文化。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結果則是萬馬齊喑，全國上下只讀一個人的書，只聽一個人的話，一心一意做權力的馴服工具……

二、中國文化重建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中國作為一個正在崛起的大國，正日益以自己的政治、經濟甚至軍事實力影響着我們所生存的這個世界，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中國人留學、經商、旅行、文化交流的腳步正在踏遍這個世界，中國製造的商品也像無處不在的空氣一樣，正越來越充斥着這個世界的每一個角落。有錢了，也就任性，中國遊客所到之處，往往豪擲千金在所不惜。日本的馬桶蓋，美國直銷產品店的名牌箱包都曾讓並且正繼續讓中國的購物狂們趨之若鶩。大概為了更好地塑造中國是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形象，或者也想改變中國在西方人心目中“一闊臉就變”的土豪形象，國家這些年從文化戰略的高度着眼，在督促文化要走出去擁抱世界並與世界交流的同時，也大手筆地讓“孔子學院”在許多西方國家以及發展中國家遍地開花。但是，說實在的，在我看來，所有這些文化交流活動，所有這些孔子學院似乎與文化、與孔子都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

不能說全部，但至少可以說我們許多文化交流專案的着眼點，最多也就是讓一些個人或一些團體在類似維也納金色大廳這樣的地方假公濟私地露了個臉罷了，人

們並沒有從任何媒體上看到或聽到過，我們曾通過哪些文化交流活動將我們的優秀燦爛的文化推出去並豐富和影響了某個國家人民的精神生活和生存發展，當然更沒有聽說我們通過交流又從別的國家學到了什麼對我們有用的可以幫助我們持續發展和進步的文化。相反，一提到外國的文化，尤其是西方的文化，西方的價值觀，很多人似乎都很敏感，馬上就情不自禁地會與“西方反華勢力”，“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等同起來。

至於說到孔子學院，據我觀察，大多數也並沒有在認真地弘揚孔子學說和儒家文化，而僅止於教習漢語而已。並非不教，而是不能。因為自己本身還沒有準備好去弘揚儒家學說，去勸導全國人民實踐“仁義禮智信”，所以只能先從教外國人“牙牙學語”開始。

但是，很顯然，中國要對人類作出更大的貢獻，要真正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沒有文化上自立，那肯定是不行的。外匯存底再多，在別人的眼裏，即便從好一點的方面想，你至多也還是一個土豪。所以，有沒有自己的文化，這文化又能不能走出去並讓別人感興趣並接納，這不僅關乎到中國、中華民族的面子，也決定了中國、中華民族在文化的層面 and 精神的層面對世界能有怎樣的影響力。

另外，從“裏子”着眼，中國文化的重建也已經到了一個機不可失、時不我待的關鍵節點。

改革開放以來，隨着經濟的高度繁榮，一個不爭的事實是：我們整個社會的公信力正日益下降，商業上的坑蒙拐騙，官場上的腐敗墮落，學術上的造假，教育上的銅臭，文化上的爭媚邀寵，下半身寫作……已讓神州大地瘡痍滿目，不堪目睹。牛有瘋牛病，豬有豬蹄疫，雞鴨有禽流感，蔬菜有農藥殘留，地下有重金屬污染，天上有霧霾籠罩……以至於朝有貪官污吏，市有不法奸商，路有行屍走肉。我曾在

微博上議論天上遮天蔽日的霧霾時說過這樣一句話：“所有天上的霧霾其實都是人類心靈霧霾的折射。”自然的最大的也是最根本的破壞力，均來自人對物質貪得無厭，以及對自然毫無敬畏之心。而所有這些，一方面說明了我們的體制還需要大刀闊斧的變革，另一方面我們的文化也亟待重建。

從五四運動“打倒孔家店”，再到文化大革命砸爛“封資修”，再到批林批孔運動中“評法反儒”，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屬於“大道”的部分，基本上都已經被清除得一乾二淨，只有屬於“術數”的部分，例如權謀文化，官本位文化，奴才文化，頌聖文化，瞞和騙的文化等，還似乎堅不可摧地紮根於中國人的血脈中。

而如果我們從一個自然人最基本的良心出發，而不是睜着眼睛說瞎話的話，也可以看到另一個有目共睹的事實：我們所宣揚的許多思想、理念、意識形態和信仰僅僅停留在媒體上和口頭上，再不能和從前一樣深入人心。甚至可以說連那些寫這些文章，作這些報告的人也心知肚明：那都是自欺欺人的文字。所以，高層在十八大、十九大以後都曾鄭重提出要弘揚和繼承中國傳統文化，許多宣傳部門也大張旗鼓地提出要“傳承中華文脈”。領導者們大概也是敏感到了文化的缺失和缺失的文化，已遠遠不能滿足飛速發展的經濟的需要，對外交流的需要，國家形象的需要，人民精神生活的需要，當然，可能還有維穩的需要。

鑒於在一個普遍失去信仰的土地上，人們要麼不信，要麼迷信，不僅迷信鬼神，同時還迷信金錢萬能，權力至上。所以，要重新收拾人心，阻止一個時代和社會迅速滑向沉淪，文化的重建也就顯得特別的必要和迫切。這也是時代賦予每個中國人，尤其身處海內外的文化人義不容辭的迫在眉睫的責任。

三、重建的首要工作是對中國傳統文化加以梳理

談到中國文化的重建，斷不能不說到五四新文化運動。新文化運動中三股主要思潮若保守主義、自由主義以及激進主義為了救亡圖存，在向西方文明學習的過程中，都曾十分注重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剖析和梳理，並為整個新文化運動的發展作出了自己獨到的貢獻。其中，胡適先生提出的“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曾發展成一場規模較大的“整理國故運動”。而他的“再造文明”的說法，在今天的我們看來，也就是要在學習西方，整理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上重建中國文化。那麼，今天的我們重新來“整理國故”，應該從哪些方面着手呢？竊以為，既然是重建，當然是在原有的基礎上再造。故當務之急首先是要對中國傳統文化從整體上加以梳理，就像農民每年春播夏種之前都要選種一樣，要找出那些至今仍然具有現代性和普世價值的部分，來與西方現代文明中優秀的並代表着整個人類前進方向的部分進行嫁接或雜交，最終形成一種文化的和社會的共識，用以指導現代中國人的精神生活，維繫中華民族的文脈和國家的穩定、團結和統一，並從文化的層面既融入又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這一點，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先生對水稻雜交的研究對於我們會很有啟發。用怎樣的母本，與怎樣的野稗雜交，都是需要我們運用科學的態度去仔細遴選的。

類似於水稻的雜交，我們所做的文化重建的工作其實也就是一種文化雜交的工作。動物界的雜交研究中，從增加奶的產量或肉的產量，提高奔跑的速度或耐力等不同的要求出發，曾研究出“同質選配”，或“異質選配”等幾種不同的雜交形式。

那麼，我們文化重建的目標和出發點究竟在哪里呢？

這裏，套用馬克思曾說過的一句話：“共產主義不僅僅將物質產品的極大豐富作為自己的最終社會理想，它還有一個更偉大、更崇高的目標，那就是要使人得到最充分、最全面、最合乎人性的發展。”

故我們在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梳理的過程中，首先是要找出哪些具有現代性，符合人性的發展，同時又能和普世價值相關聯和吻合的部分。

細究中國傳統文化，首先當然離不開春秋戰國時期的諸子百家，其主要人物有孔子、孟子、墨子、荀子、老子、莊子、列子、韓非子、商鞅、孫武、孫臏、張儀、蘇秦等。主要流派則有：儒、道、陰陽、法、名、墨、縱橫、雜、農、小說。除去小說不談，史稱“九流十家”。但我們今天粗略看過去，主導中國傳統文化的主要還是儒道佛三家。只是這三家的文化，在歷史的演進過程中，為求得自身的生存和發展，也曾不斷地與當政者以及時俗妥協，並在與其它文化的相互排斥、相互鬥爭的過程中相互借鑒、相互補充。這樣，有時，優秀的部分可能被掩蓋甚至雪藏，有時，糟粕的部分則又可能被發揚光大，以至於魚龍混雜，泥沙俱下，這倒是很考驗我們的眼力和智慧的。以儒家文化而論，它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宣揚等級制度的陳腐說教，很顯然，不但與時代脫節，且與現代性相距甚遠，故在五四運動中，“孔家店”首先被打倒，也就不足為怪。而孟子的一些言論，諸如“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民為貴，君為輕，社稷次之”，所透露出的平權意識和民本主義思想，就很有現代意義。又如道家文化，雖後來發展到道教的煉丹制藥，求仙拜神，驅鬼辟邪以求長生，以至於劍走偏鋒，走火入魔，但其恢宏的哲學思辨，強調陰陽平衡，“人道損不足以奉有餘，天道損有餘而補不足”，“為學日漸，為道日損，損而又損，以至於無為”等理念，和當今我們所提倡的和諧社會，科學發展觀倒都是很貼近的。又如佛家，本是外來的價值觀，開始

流入中土時，曾被儒生和道士們視為寇仇。儒家聲稱“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又提倡忠君愛國，佛家偏偏主張出家修行，沙門不敬王者。故佛教為獲得在中國的發展，只能一步步向儒教妥協，同時承認皇權的至高無上。道家和佛家的關係比較複雜，在玄學方面，道家談無，佛家說空，粗看上去很有共同之處，但其實細究下去，道家的無還是二元對立的概念，佛家的空，則看破了世界因緣聚合離散看似真實為幻的空相，故在對世相的總體認識和把握上更為究竟。所以，道佛之爭，主要是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在理念上的爭辯。而佛教最終能夠在中國“一花開五葉”，主要還是得益於禪宗南宗將中國本土的玄學發展和提升到禪學，並吸引了大批的士大夫文人階層作為自己的粉絲和信徒，而自此，佛教也有了自己的面目，並被稱之為中國佛教，流布到日本、朝鮮、以及東南亞各國。但是，佛家的一個最基本的思想，觀自在，眾生平等，慈悲為懷，卻始終未能真正融入中國文化的主流，反倒是一直與西方文明的主流精神“自由、平等、博愛”隔世相望，望洋興嘆，惺惺相惜。

通過這樣概略的梳理，我們大致可分辨出，無論儒家、道家、還是佛家，它們的文化面目其實遠比我們想像的要複雜。儒家一方面為我們提供了諸如“仁義禮智信”這樣崇高的道德信條，另一方面也為整個封建社會量身打造了等級森嚴的，讓人同時是奴才同時又是暴君的官本位文化、忠君文化，頌聖文化。而道教的求仙拜神，煉丹制藥，以求長身不老，最後證明都是自欺欺人，但通過煉丹的實踐，卻促進了中國早期科學的發展和進步。而佛家文化一旦以宗教的面目出現，漸漸地，也時常走了樣，成為人們求官、求財、求子、求福，搞迷信活動的行賄場所。

我們除了對儒道佛三家的文化要加以梳理。還有其他的文化，例如法家的文化，兵家的文化，權謀家的文化也要仔細加以分析和研究。古人都知道，兵者，詭

道也，不得已而用之。可你到我們的書攤上去走一走，大行其道的正是這樣一些搞陰謀和詐術的文字，如《厚黑學》、《官場手冊》、《揣摩術》、《商場行銷策略》、《兵法與企業管理》、《三十六計詳解》等。又如，發財的文化在中國也是大行其道，以至於中國人春節最主要的祝福語便是“恭喜發財”。但卻很少有人真正認識到什麼是財富的性質，什麼是財富的精神。以至於中國人從皇帝到普通老百姓，滿腦子所想的都是江山要傳萬世，財富要過三代。殊不知，財富如水，會流動，會蒸發，會凍結，既能以柔克剛，又能藏汗納垢，且最後總是往低處流的。故財富之水雖能載舟，亦能覆舟。

提到中國傳統文化，宋代的“程朱理學”也是斷斷繞不過去的一節。程頤、程灝兄弟和朱熹在他們所處的那個時代，宣導理學，其實也是懷著雄心大志要整合中國的傳統文化，並試圖讓儒釋道三家合流的。作為這種整合的結果，他們在中國文化史上曾提出了一個十分著名的口號，叫作“存天理、滅人欲”。這裏，不用天道，而用天理一詞，他們肯定也是殫精竭慮，別有用心的。天可以是指上天，未知的超自然力。但也可以是指君王和皇帝，“君權神授”，皇帝便是上天派駐到人間管理、統治芸芸眾生的兒子，亦稱天子。因此，天理二字既可理解為是符合宇宙規律的道，也可以是天子管理人間，維持人間秩序，約束人們行為的各種道德規範和法則。再簡單點，天子的話就是“天理”，“一句頂一萬句”，必須“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故存這樣的天理，在實質上也是隱晦曲折地向當政者表了忠心，聰明的統治者肯定也會“龍顏大悅”的。無怪乎朱熹後來也有機會進入了皇帝冊封的“聖人”的殿堂。至於“滅人欲”，則在道家的“清心寡欲”和佛家的“戒欲”之基礎上，又大踏步地向前跨進了一步。但這一步步子顯然跨得有些大，因為一旦

真正實行“滅人欲”（一說“去人欲”），人類社會大概不出幾代人就會終結了。無怪乎清代的大學者王夫之曾就此質疑：“人欲就不是天理嗎？”

這麼簡單的一個屬於常識的問題，從朱熹以後 500 年內竟沒有人提出過任何質疑。這就很奇怪。但考慮到號召整個社會“滅人欲”，最大得益者應該是統治者，這也就很好理解了。試着想一想，所有的臣民們滿腦子的“忠君”思想，聽天子的話，跟天子走。雖有五欲“財色名食睡”，卻統統滅掉，不貪財、不好色、不追名，又不愛吃，不想睡，還有什麼樣的臣民比這還要好統治呢？所以，很顯然地，這種“滅人欲”的話基本上就是說給老百姓聽的。因為作天子的，以及作天子家臣的，基本上都不在此列。因為天子可以三宮六院，錦衣玉食，大臣們也可以三妻四妾，享受“特供”……

沿着這一思路想下去，我發覺文化大革命儘管砸爛封資修，把所有的舊文化都掀了個底朝天，但其領導人至少在潛意識裏還是很自覺地踐行着程朱理學的。我也驚訝地發現，其實千百年來，還沒有任何一個朝代能夠像四人幫他們那樣，運用一切可以運用的行政手段，動員一切可以動員的專政力量，將“存天理，滅人欲”這六個字做到極致。什麼是天理？語錄本裏面早就說得清清楚楚——“馬克思主義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毛澤東思想又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所以，誰也不要另搞一套，只要存此“天理”，大搞階級鬥爭，進一步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狠鬥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即可。而“滅人欲”，便是“狠鬥私字一閃念”、“靈魂深處鬧革命”、“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大割資本主義尾巴”……最終，當權者可以享受“特供”，老百姓卻只能餓着肚子幹革命，於是，整個社會便失去了發展經濟的內在動力，以至國民經濟走到崩潰的邊緣。文革結束後，不再滅人欲了，提倡“發家致富光榮”，“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經濟才又

重新復蘇，並逐步走向繁榮。但可惜的是，我們中國人用了上千年去努力實踐的雖然有些空洞和虛偽，但畢竟還是以精神追求作為導向的口號“存天理，滅人欲”，改革開放以來，僅僅用了不到三十年的時間，便將其做到了反面，而且也是極致，那就是“存人欲，去天理”。而這一切都是對財富的執着和貪戀惹得禍。因此，我在我的長篇思想文化隨筆《財富如水》一書的結尾部分，這樣寫道：“是的，財富如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我真想用如椽巨筆在天空、大海、山巔都寫下這幾個字。我也想用蠅頭小楷在人人的心頭都寫下這幾個字。同時，我還想在東土和西天壁立千仞的石崖上深深刻下另外六個字——“合天道，衡人欲”。

契合天道，平衡人欲。——這才是人類、人生應該追求的目標，應該遵循的方向。也是中國文化重建應有的目標和努力的方向。

四、重建中國文化必須放下身段，認真學習、吸取和借鑒當代西方文明的優秀成果

五四運動曾大張旗鼓地提出要學習西方，並高揚德先生和賽先生兩面旗幟。甚至連魯迅先生也曾提出“全盤西化”和“拿來主義”。那麼，站在今天中國有些荒蕪的文化園地裏，我們究竟應該怎樣去學習西方，借鑒西方，擁抱西方文明的優秀成果呢？

其實，文革結束，國門打開，中國便已經開始了這種學習、借鑒和擁抱的過程。至少從建築文化、商業文化、服裝文化、金融文化、互聯網文化等方面，我們差不多可以說是比西方還要西方了。但在制度性的文化，平等的文化，自由的文化，創新的文化，張揚個性的文化等等方面，我們常常要麼採取的是鴛鴦政策，要

麼便是敵視的態度，很少能在報刊雜誌上見到心平氣和的討論。所以，事實上，我們到目前為止，對西方文明和西方文化所採取的態度，基本上還是沿襲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老舊的思路。故中國文化的重建一個重要的任務便是要全面而深入地擁抱西方文明和文化的一切優秀成果。

這方面，身在港澳臺地區以及移居海外的大量華人專家、學者具有特別的優勢。一方面，中華文脈的血液一直在他們的血管中流淌着，同時，他們因為一直浸淫在西方文明和西方文化的沃土中，耳濡目染，對中西方文化的優劣，常常有更深刻而獨到的體會和體驗。同時，他們因為精神上受束縛較少，比較能夠自由地思想，也較有獨立的人格，故他們應該是中國文化重建運動中的主力軍。而港澳地區，我個人也很期待它能成為中國文化重建運動的發源地和重鎮。

當然，我們說中國文化重建，從中國角度看，可以視為是中國知識界、海內外華人文化精英繼承“五四新文化運動”之餘緒，所發動的又一場“新啟蒙運動”，或曰“新新文化運動”。但它也是人類文明，東西方文化在新世紀、新時代重建和整合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人類正進入全球化時代，經濟、政治、文化越來越融為一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既互相排斥，又互相吸引，既互相鬥爭，又互相依存，是曰“同體大悲”。在這種情況下，已不可能再有，也不允許再有一種地域性的文化——儘管很古老甚至很有影響力，可以完全獨立於世界主流文化之外。中國知識界、文化界，作為社會的良心，不僅要對挽救中國的世道人心恪盡自己的責任，同時更要對東西方文化的整合，世界主流文化的重建作出自己應有的貢獻。

所以，今天站在澳門大學歷史文化研究中心這個講臺上，我也鄭重地提議並希望歷史文化研究中心能夠建立一個可以供全球華人學者、專家嚴肅思考、理性討論、認真發聲、積極建言的“中國文化重建論壇”。

相信通過這個論壇的年復一年的討論，中國文化重建這個題目一定會日益深入人心，並取得積極的成果，我們的國家也一定可以從這種對中西方文化的深刻反思中尋找到一條真正屬於自己的獨特的可持續發展的道路，而我們整個中華民族也一定會因為有了屬於自己的“新新文化”，將以更加嶄新的文化面目——而非一身銅臭氣的土財主——的形象，屹立在世界的東方！

總之，為千秋萬代計，為中華民族的生存計，為世界大同的人類理想計，我們都迫切需要對中國傳統文化加以梳理，找出那些適合中國社會發展的優秀的部分，去與人類文明和世界文化的優秀成果進行雜交和嫁接，重建我們的文化。這種經過重建過後的文化，將既繼承傳統又區別於傳統，既學習西方又區別於西方，不僅可以形成一個嶄新的中國新新文化的面貌，同時也實實在在地可以用來救國、救民、救資源、救藍天，當然更重要的還是救人心……

這是歷史對我們的要求，也是民族對我們的期待，更是我們海內外知識分子尤其文化人義不容辭的責任！